



深圳文艺理论批评丛书

守望 与 突进

SHOU WANG
YU TU JIN

安裴智 著

海天出版社



深圳文艺理论批评丛书

守望 与突进

SHOU WANG YU TU JIN

安裴智文学评论集

AN PEI ZHI WEN XUE PING LUN JI

安裴智 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望与突进 / 安裴智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07.7

(深圳文艺理论批评丛书)

ISBN 978-7-80747-032-8

I. 守… II. 安… III. ①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国
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37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6445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蒋鸿雁 责任校对：刘宗明

责任技编：钟愉琼 装帧设计：海天龙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制作输出 Tel: 83461000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17.125

字数：360千字

总定价：225.00元(共9册)

本册定价：35.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守望與突進

癸未秋
周汝昌



2003年秋，红学泰斗、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书法家、诗人周汝昌先生在两耳失聪、双目几乎失明的85岁高龄，挥毫为笔者的文艺评论集《守望与突进》题写书名。

深圳文艺理论批评丛书编委会成员

主 编：董小明

副主编：胡经之 杨宏海

编 委：董小明 胡经之 杨宏海

谢君心 吴俊忠 王廉运

姚 峰 李 华 刘上江

文艺评论求创新

胡经之

文艺评论乃应文艺创作的发展需要而产生，但一旦产生，反过来也可以对文艺创作起促进作用，具有相对独立性。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必不可少。

深圳在成为特区之前，虽然只是一个两万多人口的边陲小镇，但早已受岭南文化传统的哺育，有着自己的文学艺术。我清楚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初来深圳，就已见识到东门老街上的电影院、粤剧团和新华书店，也感受到深圳本土古朴民风。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大量移民的涌入，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促使深圳的文化艺术进入新时代。1984年深圳开始有了长篇小说，也首次出现了画展，《特区文学》杂志也诞生了。但文艺评论滞后于文艺创作，好几年后，《深圳特区报》开辟文艺副刊，文艺评论才有了发表的机会，但一时也很难活跃起来。

在特区成立的最初十年，文艺创作发展较快，但文艺评论发展较慢。深圳不仅有了专业作家，而且业余作家不断涌现。文艺评论却没有专业人士，只有业余爱好者，也为数不多。从粤北闯入深圳的青年作家刘西鸿发表了短篇小说《你不可改变我》，引起国内文坛的关注，1986年在广州为她召开作品研讨会，出席的大多为广州的评论家，听不到深圳的评论之声。要在好几年后，才逐渐有深圳自己的评论爱好者，在深圳参与本土作家、艺术家的作品研讨会。

等到跨入九十年代之后，深圳开始反思文艺十年的得失，逐渐意识到文艺评论对于文艺创作发展具有巨大作用，迫切需要文艺评论。若要培育既具有时代精神又有深圳特色的文艺精品，就必须发展文艺评论。于是，好几个报刊上陆续开辟了“文艺评论”、“文化广场”的专版或专栏，为文艺评论提供了阵地，文艺评论逐渐活跃起来。1992年，海天出版社出版了深圳自己的第一本文艺评论集，名叫《文艺评论选：1980-1992》。接着，在1994年，文联举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深圳文艺发展理论研讨会”，深圳本地和外地的文艺评论家共聚一堂，为深圳的文学艺术发展献计献策。在论文集《春华秋实》一书中，不仅对深圳今后文艺发展的未来作了展望，而且对文艺评论的作用作了进一步阐发。

目标的现代化城市，不仅要创作出许多具有自己特色的艺术精品，也要树立起自己的理论航标。为了进一步促进文艺评论的发展，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在走过第一个十年，跨入第二个十年之际，主编出版这套《深圳文艺理论批评丛书》，选编了深圳文艺评论工作者所写的文艺评论著作十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艺评论伴随文化立市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文艺批评关注深圳文艺的最新成果。

收入丛书的这十部书稿，有的专论深圳的文学艺术，有的在论及深圳文艺现象的同时，也涉猎了深圳的许多文化现象，甚至，还涉及国内其他地域和海外的文学艺术，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着对深圳文艺的关注和论说。作者都是在深圳工作而且熟悉深圳文艺的评论工作者，对深圳文艺现象，都有过思考，像李小甘，改革开放之初就来到深圳，长期从事深圳的文艺发展规划工作，熟悉深圳文艺发展历程，他的文艺评论集《三文集》，不仅反映了深圳这座城市的文学、电影、电视、舞蹈、美术等文化艺术的发展轨迹，而且对文化艺术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倪鹤琴则更将深圳的文化艺术放在世界文化视野中来考察，对深圳提出“文化立市”以来的文化艺术走向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这本题名《文化致远》的专著，颇具学术的独创性。李华的《不甘悬置》把笔力集中于深圳文学艺术，作出了富有特色的探索和批评，不仅勾画出深圳文艺的发展历程，而且洋溢着浓郁的“深圳情结”，进而探讨深圳文艺评论本身的“本土性”。其他几位作者，侯军、钱超英、周思明、刘子建、黄永健、安裴智等，也都分别对文学、美术、影视、戏剧等作了重点探讨，各有所长，自成特色。这些文艺评论，大都是面向文艺创作而作，编委会鼓励文艺评论本身的多样化，希望有人能对深圳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的创作经历也能作些研究和探讨。研究美学的陈吉庆对一位评论工作者的美学生涯感到兴趣，写出了一本专著。这是推广本土艺术家、特别是老一辈有成就的艺术家的一次有益尝试，编委会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开头，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类似的本土文艺家专论著作的出现，文艺评论也要自主创新，逐渐多样化。

文学艺术的根本使命就在于遵循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高扬真、善、

美，鞭鞑假、恶、丑，“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文艺评论就是要把“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结合和统一起来，对文艺创作进行美学评价和历史评价，推动文学艺术向先进文化方向发展。十多年来，文艺评论曾对移民文学、打工文学、青春写作、都市文化、大众文化、都市山水画等重大问题进行理论探讨；跨入新世纪以来，在“文化立市”的推动下，深圳的文化蓬勃发展，更趋向于多元化，形成深圳文化的新格局：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主流文化，正在稳健地往前推进；高雅文化的普及，正在加大力度，渐成气候；大众文化遍地开花，蓬勃发展，正在渐具深圳特色。文学艺术，作为精神文化的重要部分，在文化新格局中亦在发生着变化。由于日常生活正在日益向审美化发展，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差别正在缩小，那么，文学艺术还能起什么作用，还需要发展吗？又由于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电影、电视、电脑的技术不断创新，已在和新的文学艺术相融合，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相形失色，过去主要依靠文学语言为手段的文学艺术将走向何方？再由于消费时代的迅速来临，文化的产业化批量生产，创意产业、体验经济、审美文化的迅猛崛起，文学艺术也成了商品，为消费大众快速消费，那么，消费时代还要去创造艺术精品吗？我们究竟应怎样看待艺术生产的交换价值和审美价值，是否还需要“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等等新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

在文学艺术发展急速变化的时代，我们更需要文艺评论，不能回避发展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深圳文艺评论在今后发展中，需要面向现实，与时俱进，研究新现象，解决新问题。这就促使文艺评论本身要不断创新，不仅文化视野要更加广阔，了解世界文化发生了什么变动，更要研究我们自己文艺实践中的新问题，深挖下去，抓住矛盾。这样，文艺评论必然要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把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紧密结合，促进高雅文化的更加普及，促使主流文化向雅俗共赏的方向发展，让大众文化不时得到提升，让不同层次的文学艺术都能“按照美的规律”来发展，各得其所，相得益彰。

祝愿深圳的文艺评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2006年9月于望海书斋

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的融合

胡经之

不时有内地一些文学研究生来访，探询在深圳能否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对于那些执著于古典文学的博士、硕士，我总是坦率相告：很难。凭我在北大卅多年的老经验，深知老校的专业分工很细，学古典文学的，一门心思读古籍，不懂外国文学，不读当代作品，也很少问津美学、文艺学，真是隔行如隔山。这样的博士、硕士，当然最好去研究所，或去学校教古典文学，这才适合于专业的发展。

当我看了安裴智的文艺评论集《守望与突进》书稿之后，我发现我需要改变这种观念。这位曾专注于钻研元明清小说和戏曲的古典文学硕士，长久沉浸于中国古典历史悲剧之中，入乎其内，思考甚深，写出了十多篇论文。其后，却又能出乎其外，视野扩及当代文艺，再入乎其内，深入钻研，写出了不少当代文艺评论。他对当代文艺的评论，涉猎甚广，电影、电视剧、戏剧、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都在他的视野之内，甚至还对当前出现的许多文艺现象作过精辟的分析，抨击时弊，与时俱进。他到深圳也就三年光景，但又很快进入深圳的文化“情景”，入乎其内，密切关注深圳的文化发展，引发出“鹏城文思”，写出了不少文化评论。这样，他的这本文艺评论集，竟有38万字，如此厚重，实为难得。

由此而使我悟得，事在人为，人的潜能在实践中发展才逐渐显示出来。在学校的专业学习，只是为后来的实践打基础，未来如何发展，却要靠自己。专业基础知识当然很重要，裴智的古典文学基础很厚实，所以能很快进入中国古典历史悲剧的研究之中。但他的知识面很广，特别爱好美学、文艺学，从中吸取营养，作为研究文学艺术的方法。他曾和我谈及：“早在上大学时，我就对文艺美学感兴趣，除选修文艺美学课程外，还阅读了大量文艺美学的书。”经典的美学，新出版的当代美学、文艺学，他都读，北大的“文艺美学丛书”数十本，他全有。参加工作后，他积极关注当代美学的发展动态，与国内美学界和评论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加入了中华美学学会，在新闻采编之余多年兼任山西省美学学会副秘书长，执行编辑《山西美学通讯》。

正因为裴智的视野广阔，不只埋在古书堆中，而能不时关注理论发展与思潮动向，能以理论作为分析的手段，用来解析文学艺术实践中的问题，所以，他写文艺评论就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是隔靴搔痒，不是就事论事，即使研究古典文学，也会既有历史感，又有时代感。

就说他对中国古典戏剧的研究，他在掌握了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着重在理论上把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结合起来，对“中国古典历史悲剧”作了深入的剖析，不是罗列历史现象。中国古典戏曲，浩如烟海，存剧目的就有四千七百余种，而其中历史悲剧就有四分之一左右，形成相对独立而完整的审美系统。但历来的古典文学研究，却很少能从理论上对此作全面的探索。若能从理论上对中国古典历史悲剧作系统的考察，研究它的审美品格、思想意蕴、创作规律，作出理论的概括，必将推动中国古典戏剧研究走向新的里程，亦将对中国美学的重构起积极作用。裴智潜心于此，全面审视了中国古典历史悲剧的发展历程，从“心灵历史的艺术透视”开始，经过“伦理教化的单纯传声筒”，走向“社会现实的无情揭露”、“人生哲理的深沉思索”，一直到“理想人格的痛苦追忆”。他研究得出结论：“在元、明、清三个不同的朝代，由于历史背景的更替、社会思潮的变异，历史悲剧创作的美学重心呈现了特质迥异的属性。从总体看，我国古典历史悲剧的宏观走向为：由元代抒写心灵的抒情性表现悲剧，发展为明清之际以揭露社会现实的黑暗为主旨的叙事性再现悲剧；由元末明初质量低劣的伦理说教剧，演变为明清时代艺术质量上乘的忠奸模式悲剧；另外，还存在着另一类对逝去的理想化人物的痛苦追忆与无尽怀念的寄托短剧；而将抒情性表现原则与叙事性再现原则二者结合起来，并表露出对人生、社会、国家、民族、历史和命运的富有哲理意味的深沉思索，则是我国古典历史悲剧创作的最高峰——《长生殿》与《桃花扇》。抒写心灵剧、伦理教化剧、社会问题剧和人生哲理剧，正是中国古典历史悲剧在自身发展中所形成的四种最基本的类型。”经他的论证与梳理，中国古典历史悲剧的历史脉络、动态流程和美学走向，就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裴智并不停留于此，而是更从美学上切入具体的戏剧文本，结合艺术实践进行艺术解剖，动静交错，形而上和形而下相结合，层层剥笋，步

步深入。这样,裴智对中国古典历史悲剧的探索,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可谓是独辟蹊径,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

中国古典历史悲剧和西方的古典历史悲剧一样,都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恩格斯语)。但中国古典历史悲剧自有中国的历史特点,裴智对此作了深入的剖析,指出中国古典历史悲剧,乃是体现了悲剧美学特质的历史剧,而非一般的历史剧,但又非一般的悲剧,乃是历史剧和悲剧的结合,具有两重性。在论述中国古典历史悲剧的审美特质时,裴智更进一步,还对我国曾出现过的关于历史剧的理论争辩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见解,颇具创见。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国曾有过关于历史剧的理论争辩,出现两种理论倾向。一是“重史”的倾向,二是“重剧”的倾向。“重史”的理论,突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历史剧的任务是反映历史的实际情况”(吴晗)。“重剧”的理论,则强调:“无论在怎样反映历史真实的情况下,历史剧都要求(不是允许)虚构”(李希凡)。著名作家茅盾更把历史剧分成三类:真人假事、假人真事、假人假事,都可进入历史剧。裴智以为,这两种理论倾向各有其片面性,“重史”派片面突出“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以再现历史事实来代替艺术创作,武断“历史一定是这样发展的”;而“重剧”派则片面夸大艺术虚构,不必有历史依据,武断“历史很可能是这样发展的”。裴智以为,历史剧创作应把“可能性”和“必然性”结合起来。依裴智之见,“历史剧是根据可能性与必然性相结合的美学原则,以历史事实为基础,进行反映历史本质真实和历史精神真实的艺术创造的一种戏剧样式”、“历史悲剧起码具备三重规定性,那就是题材来源的必然性、表现内容的可能性与美学倾向上的悲剧特性。这三种属性在历史悲剧里融为一体,使它既表现了史剧的质的规定性,又富有悲剧的特有美学特质。”裴智正是从这个美学观点来研究中国古典历史悲剧,将古典戏剧的研究推向深入的。

当裴智的眼光朝向当代文学艺术时,他的坚实的理论功底和犀利的理论分析能力助他很快进入当代批评语境。他的评论首先进入那些历史题材的影视、戏剧。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一出来,一片赞扬声,他

却较早就指出了改编的失误之处，甚有见地。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问世，裴智立即撰文肯定此剧洋溢着时代精神，富有艺术魅力。他对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得失，也有很精辟的分析。他的评论，一贯坚持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相结合，具体作品作具体分析，不作虚妄之言。比如他分析电视剧《红楼梦》的缺点，虚与实比例关系不当，远与近心理距离失调，主与次描写重点转移，首与尾情节结构断裂，而根本原因就在于对小说原著审美意蕴缺乏整体把握，对影视艺术和语言艺术的审美品格缺乏有效的转换，这和我的感受十分接近。又如评说《一代廉吏于成龙》，乃是一部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优秀电视剧，所以深受广大观众赏识。此剧成功地处理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戏剧性和抒情性结合得好，特别是，编导从当代审美理想出发，以现代精神审视过去历史，站在时代高度来评说历史，为广大观众喜闻乐见，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面对蜂拥而来的改编历史的“制作”大潮，裴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不少历史影视剧、历史长篇小说中渲染的“权谋文化”作了尖锐而中肯的批评，甚至对张艺谋执导的《英雄》也敢于指出其中的“文化作秀”，作出了入木三分的犀利解剖。

追随文学艺术的足迹，裴智与时俱进，视野愈益扩展，陈香梅散文、贾平凹的《废都》、董鼎山的小说、赵瑜的报告文学、阎延文的《台湾风云》、哲夫的《黑雪》、《毒吻》、朱文的《我爱美元》等等，他都有精到的评论。对于张平这位以关心公共利益和百姓命运而著名的作家的作品，关注尤多，几乎是跟踪追进，从他早期的《法撼汾西》、《天网》，一直到最新出版的、发生重大影响的几部长篇《抉择》、《十面埋伏》等，都有自己的新见。在作家、作品评论之外，裴智进而对当下现实中出现的不少文艺现象，时常发表评论，如文艺如何民族化，如何推进文艺批评等，都能独抒己见。在国内商潮涌起之后，一些媒介猛炒歌星、影星、笑星，裴智却不时去造访一些专家、学者，和美学家、红学家、文艺学家王朝闻、周汝昌、舒乙、刘锡庆、樊发稼、莫言、李锐、杨争光等进行学术对话，由此更显示出裴智那种在商潮中不随波逐流，执著于追寻正义与真理的学术品格。近数年，喧嚣滚腾的文艺舞台上，一方面拒绝“宏大叙事”，竭力

“躲避崇高”；另一方面却对暴力、色情、权谋津津乐道，不惜工本投入“宏大制作”。如果没有真正的文艺批评，我们如何对此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时代要求发展真正的文艺批评，千万不能以一片叫好声所淹没的娱乐报道来代替文艺批评。我盼望裴智今后仍要发扬这种敢于批判的美学精神。

使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三年前裴智刚来深圳不久，就已很快关注起这个新都市的文化艺术，迅速进入此情此景，写起文化评论。收入这本文艺评论集的第五部分“鹏城文学管窥”就有十多篇，对杨黎光、杨宏海、燕子、李亚威、盛琼、黄啸等人的创作均有所评论。不仅评论作家作品，他还关注深圳文化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如何多出艺术精品、如何发展新都市文学、如何评价打工文学等等。而放在此卷第一篇的《家园与人文》，尤能引发我们的进一步深思——深圳人应如何构筑共同的家园？

我们都盼望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什么是诗意地栖居？在海德格尔心目中，不只是占有一个物质空间，而是栖居于诗的精神世界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家园。一个人可以远离故乡，在别处寻找新的家园，但需要不断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才能长住久安，像深圳这样新崛起的新都市，更需要构筑共同家园，也更需要重视精神家园。

裴智告别故乡来到深圳时，正是这个新都市被评为“国际花园城市”不久，他一下就爱上了这个新都市，准备在此安居乐业，做出自己的奉献。广读诗书、涉足文坛的他，很快就意识到在这里构筑精神家园的迫切需要。当他看到香港作家盼耕所写的《另一类生态平衡》一文之后，裴智有感而发，觉得在深圳不仅要寻觅一个生存空间，可以栖身，更需要构筑精神家园，安放灵魂。而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正应是这座新都市的现代灵魂。像盼耕那样，生活在繁华喧嚣的“动感之都”，却要跑到“特区后花园”里来，就是为寻找灵魂漂泊的港湾，找回失落了百年的精神家园，而对这“国际花园城市”，裴智一下就感悟到，他要在这里安顿下来，就要为构筑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做些贡献。来深圳的三年里，他先是在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做文化研究，为参与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而尽心尽力，后来又特区报参与文艺评论工作，其实都在围绕构筑共同的精神家园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都说深圳是个移民城市，移民来自五湖四海，这个边陲小镇，周围都是不大的丘陵、山坡（有近千个），由水沟冲积出来的狭小平地上，原先只有二万多人。到改革开放建成特区，1984年我到这里时也只二三十万人口。到裴智来时，人口已超出六百万。如今，说已七百万，实际已超千万。林子大了，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会发生，想“过一把瘾就死”的有之，想“捞一把就走”者有之，这里只是匆匆过客的驿站。但想在这里安居乐业、建起自己的家园的终究是大多数。然而，如何构筑精神家园？特别是咱们这个新都市的共同精神家园，关心的人就少了。所以，当“文化立市”真要付诸实践，深圳必然要呼唤更多的人文学者、教育家、作家、艺术家、评论家、设计家来这里，共同奋斗，按照“美的规律”（马克思语）来建设我们的家园，构筑共同的精神家园。

裴智的文化视野甚为广阔，对当代文艺的发展势态尤其熟悉，加上理论功底坚实，善于辨析文化发展趋向，具有自己的见解，这都是他在文化艺术评论方面的优势，深圳很需要他这样的人。我一向以为，深圳真要成为国际化新都市，“文化立市”乃题中应有之义，这样，文化研究、文化评论势必要发展。一手抓创作，一手抓评论，两者相互促进，才能推进文化的繁荣。深圳的文化研究、文化评论，务必要有广阔的视野、世界的眼光，懂得世界上文化发展的趋向，作为我们的参照系，闭目塞听，闭门造车，很容易盲人骑瞎马，不知所终。但有了世界视野，我们的文化研究、文化评论还是为了解决我们自己家园里所出现的问题，以便提升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品位，而不是热闹一阵，依然故我。持有世界眼光，解决深圳问题，才会出现深圳自己的文化学派。裴智已进入深圳的文化“场”，对深圳的文化已日益熟悉起来，我很希望他能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多关注深圳文化发展中的问题，探索如何提升文化品位的途径，让大家都能诗意地栖居在这新都市里。

聊作为序，以此共勉。

2004年五一前夕

（胡经之：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艺美学学科开创人之一，现为深圳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科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文艺学博导，著名文艺理论家，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美学学会会长，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学养·领域·文化眼光

何西来

这是裴智的第一本评论结集，收录了他自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十多年间的重要文艺评论文章；按文章的内容和特点，厘为若干卷，名之曰《守望与突进》。他想守望的，或者说他认为被他所肯定的艺术家们所想守望的，是一块灵魂的净土，是精神的家园，是美好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是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但裴智并不是固步自封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更看重创新，看重发展，看重未来，热情地肯定他所看到的文艺事业的新机，珍惜每一个认真的突进。书名就是他这本评论集的主题词。

裴智要我为他作序，并且写了一封长信给我，理由是我对他了解较多，他所涉及的批评领域与我接近。他说得很对，我没有理由推辞，何况，这也是对我的尊重，我不能不识抬举。

我认识裴智是在十多年前。那时他还是刚走出校门的小青年，在《太原日报》的《双塔》副刊做编辑，副刊部的副主任陈建祖，还有报社的两位分管文化、文艺的副总编阴通三和杨士忠，都是我的朋友。《双塔》虽是一张地方报纸的副刊，但办报的人却有阔大的胸襟和不凡的眼光，关心文艺事业发展的全局，常就大家关注的重要动向和热点问题，组发文章。他们的作者队伍，不仅有本省的精英，而且不乏京城和全国各地的名家，遂使《双塔》成为九十年代为数不多的有全国影响的副刊之一。受总编和部主任的差遣，裴智常到北京组稿，参加一些文艺界的学术活动。他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态度认真而又谦和，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的许多重要文章，都是拿给他们发表的。近几年，他又“北雁南飞”，到了深圳工作，在杨黎光麾下做副刊编辑，依然勤奋；编务之余，写了不少文化艺术方面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也有一部分收在这本评论集里。

他的书稿放到我这里，很有一段时间了。看评论文章，特别是带有一定学理性的研究性论文，不像读一般的文艺作品，必须凝神静思，拿出整段的时间，有些地方还得反复看。而我为人做序，总要把人家送来的东西都看过，最后才动笔。不看人家的书，就动手做序的事，我是做不

来的，因为那样做不仅是不尊重作者和读者，而且首先是不尊重自己。如果你是名人，那就是自己砸牌子，自损名声。所以，尽管裴智出书的事情很紧，他也多次委婉地催我，但我还是全部读了清样，才着手写这篇序。

裴智的评论，因为涉及的范围广，延续的时间长，故可谈的话题很多，但序文篇幅有限，不可能全部拿来评论。我只想谈三点突出的印象：一，学养；二，领域；三，文化眼光。

学养，是指评论主体在从事文艺评论工作前必要的知识准备。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论及形成风格的要素时，曾提出才、气、学、习四端，其中“学有浅深”一项，指的就是学养。在《神思》篇，他还特别提出了“积学以储宝”的主张，指的也是临文者的学养。学养并不单指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它既为作家、艺术家所必备，理论家、批评家也不例外。在刘勰之后，唐代的刘知几提出了“才、学、识”的“史家三长”，其中的“学”，也是指学养和学力。中国的传统文论、史论，都很重视写作者的学养。在当代作家中，王蒙是最早提出“学者型作家”的人，以为这是作家能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关键因素。安裴智对王蒙的意见非常认同，在他自己的批评实践中经常加以强调。

在安裴智的批评理念中，学养问题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在《是拒绝“空头批评家”？还是拒绝批评？》一文里，他对徐建宏在《拒绝空头批评家》中的错误批评观念进行了商榷和批评。其实，徐建宏之所以会得出“诗人排斥批评”和“文学排斥批评”的结论，就在于他缺乏必要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史的常识，对于诗歌史和文学史，也不甚了解。裴智的批评文章写得很长，他在批评徐建宏的同时，也较为系统地谈到了不少批评理论上的重要问题。用他的话说，叫“文学常识 A、B、C”。在他看来，徐建宏立论时的先天性不足，就在于缺乏起码的学养。在《世纪末中国文坛的一幕闹剧》里，安裴智严正批评了《北京文学》1998 年第 10 期刊发的《断裂：一份问卷和 56 份答卷》，这份“问卷”和“答卷”，曾在许多有影响的报纸上炒作过，一时间成为文坛上的热点。安裴智的批评，用一种 A 和 B 对话的文体，指出“断裂”论者，即“新生代作家”持论的偏执和幼稚。提醒他们，必须用扎实的“国学”和“西学”的修养，充实自己，丰盈自己。